

北京婚礼中的满汉习俗

北京的婚礼是满族习俗与汉族习俗互相影响而形成的，是这两个民族习俗的融合体。更严格确切地说，它是在汉族婚礼习俗的基础上加入满族婚礼习俗的影响，经过融合而形成的。

汉族文化水平高且历史久，这也反映在婚礼中，其始韧久远，三代已有定制；“纳采”、“问名”等久成民俗，遍行于民间，全国各地不离此范。满族婚姻也有来源久远的习俗，史册中关于满族先世肃慎、勿吉、靺鞨等的婚姻不乏片断记述。从《金史》等书可窥女真人的婚姻概貌。到了明末，努尔哈齐以建州女真人为基础，吸收诸部女真人以组成八旗，就是现在所说的满族共同体。那时的女真人的婚姻习俗，在清初的著作如《柳边纪略》、《宁古塔记略》等书中略有记述。综观诸书所记，可知那时满族婚礼甚简，先由男家委媒赴女家提亲，女家如认为可以考虑，则第一步是“相亲”，然后下聘礼，以至于成婚。清代皇子婚姻仍然依此礼而行，不似民间那样繁复。后来北京的婚礼较此繁杂得多，那就是上述满汉二俗互相融合的结果。

稍加仔细观察北京婚礼，不难发现在这个满汉习俗的混合（融合）体中，仍有二者各自保持特色之处。例如婚礼的轿子：北京汉族人结婚用三顶轿，一顶是花轿，缎制轿围子绣大朵牡丹花和彩凤，这是新娘乘用的。另外两顶是一红一绿，是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乘坐的。北京满族人（旗人）结婚用一顶轿，轿围子不是彩缎绣花，而是一色大红喀喇呢的，称为“官轿”。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

不乘轿而坐轿车（轿车是用骡拉的，不用马拉）。因此老北京人一看便知办喜事的人家是旗人是汉人。

兹将老北京的婚姻习俗略作系统概述如下，叙述中兼及该俗的源流和演变。

婚姻的第一步包括提亲、打听、相看、合婚 共四件事 这是婚事进行的最初四项举动。婚姻的第二步包括放小定、放大定、过礼、通信、过嫁妆 共五件事 这是婚事进行的当中五项举动。婚姻的第三步包括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儿、见面分大小、吃酒开箱、拜客、回门共八件事，这是婚事进行的后部八项举动。以乐曲比拟，可以说第一步是序曲，第二步和第三步是本曲的一二乐章。以戏剧比拟，可以说全剧共有三个高潮，放大定、过礼和过嫁妆、响房发轿是两个次高潮 迎娶是最高潮 最后 吃酒开箱是大尾声。老北京的婚礼就是依此顺序而行的，民俗内容甚为丰富多彩，限于篇幅，本文只得概述其大致而已。

先谈第一步 提亲、打听、相看、合婚四件事。

提亲是男家向女家求亲，是男家委托本家（北京话称族人为“本家”。当（dàng）家子”一词不是纯北京话）亲戚和友人向希望联姻的女家求婚。北京旗人大多以此方式提亲，多委本家和亲友为媒以作介绍。另外 那时社会上有种人乐于为人“说媒”北京人称此项人为“爱喝冬瓜汤的”这项人不同于“拉纤儿的”如“拉房纤儿的”其目的是获酬 北京话所说“成三破二”就是给拉纤儿的付酬金。“喝冬瓜汤的”不取酬金，只受结婚双方赠送礼品而已。这类说媒者不限于女性，也有男性，所以不能只说这是“三姑六婆”中的一婆。这些人大多活动于汉族人家，在旗人家里吃不开。因此那时北京人的婚姻介绍分为两类，一是男方委人向女方求婚，一是媒人为双方拉线。北京旗人称此受托代为求婚者为“大媒”，有尊敬之意。前者是男方主动 多行于旗人家 后者是“说媒的”主动以言语打动男女两家，这多行于汉人家。男方主动托人向女方求

婚是满族古老的习俗。直到现在，鄂伦春、鄂温克等女真后裔仍然如此，近年来实地进行的社会调查充分证明此事。清初诸书也有满族婚姻状况如此的记载。

亲上做亲的和友谊密切的家庭互相联姻，由于彼此了解深，所以容易决定。彼此素不相识或间接相知而乏来往的，由于缺乏了解，所以为了决定就必须打听。“打听”用于说亲在北京话里已成专用的词，意思是调查了解对方的实际状况。汉族人大多由“行当”联系，并有乡谊可依。例如山东籍者多业粮行、饭庄、肉行等等，山西籍者多业洗染行、粮行、干果铺等等。这些人既是同行，又是同乡，联系时便于了解，男女两家纵不直接相识，只要通过三亲四友即可信息相通。旗人有牛录组织，有牛录章京（佐领）掌握全佐，本氏族有哈拉达和穆昆达掌握全族，所以便于了解。旗人男家托大媒向女家提亲，如女家表示可以考虑，男家即托大媒将“过门帖”交给女家。“过门帖”俗称“家门条”，用大红纸书写男家的哈拉（姓氏）、某旗第几参领、甲喇、第几佐领、牛录、某某佐领下、名字、年龄、学历、职务、住址等主要项目。有的女家要求男家在门帖上书写三代。清代满族人（包括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皆称名而不道姓，所以为了防止族内婚，必须由哈拉达证明该人的哈拉，在门帖上必须写清楚。内务府旗人则写“某某管领下”，以示包衣身份。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满族人的哈拉达大多逝世，于是引起做父母的发了一阵子愁：“娶媳妇聘姑娘不知道哈拉了，这不是糟心吗！”（现在年青的满族人很少知道自己的哈拉了。）

为了了解对方，总要亲眼看上一看才放心，因而“相看”势所必行。“相看”又称“相亲”（相字读 xiāng），十分有趣，笑话常出在这里。

那时没有舞厅、歌榭、电影院，没有晚会、舞会、联欢会。直到清末仍不演夜戏，妇女不到前三门外的戏馆子看戏。男人们终日不离职场，女子闭门家居。那时汉族男子供职于各行诸业，旗人男

子当差当兵。女子操持家务，姑娘们扎花儿做针线。本家、亲戚、友人平日很少相聚，年节拜贺只是略坐片刻，点到尽礼而已。人们相聚的良机只有“行人情、出份子”北京人常说：“咱们大棚里见”，就是说在族人戚友家办婚丧寿事时在“大棚”里见面（办事必须搭棚，以后在另文中谈谈北京的搭棚挂彩子）。于是大棚里也就成了相亲的场所，而且是主要的场所，是人们认为最合适的场所。另外还有次要的场所，就是逛庙逛什刹海荷花市场等处。东城的隆福寺为东庙，西城的白塔寺和护国寺为西庙。每月逢期开庙，百货杂陈，并演小戏杂耍，城内和近郊居民旗汉皆至，而且是男女老幼都可逛庙。再有就是什刹海，称为荷花市场，五月初一开，七月十五日闭，是男女老少齐至之所。至于逛厂甸儿游二闸等，因时日短暂更属次要。

举个例说吧。那天姑娘正坐在炕上扎花儿，是一对枕头顶儿。母亲走进屋，女儿叫了一声“奶奶”，母亲说：“姑娘扎花儿哪！”母亲坐在炕沿上，往里一凑身儿，放低了声音说：“杏格，下月初三你二婶儿娘家侄儿德禧娶媳妇儿，你跟我出份子道喜去，顺便给你二哥相相亲。”女儿说：“谁家的姑娘？”母亲说：“石碑儿胡同恩家的姑娘。她爷爷那三老爷的妹妹是你二婶娘家舅妈。”女儿说：“噢，我知道了，是牛录粘音恩四老爷的女儿吧，他们家还有个世袭拖沙拉哈番哪！”母亲：“是啊！是个根本人家儿。她太老祖儿乾隆年间随过三趟木兰围哪！（木字读 mū，重读。兰字读 len，轻读。）就这样，这位将来可能当小姑子的杏格姑娘借贺喜出份子之机参与了相亲。恩四老爷的那位女儿则完全不知此情，只知是到亲戚家道喜，不想被人暗暗地相看了。

这样的相亲不仅有欠正确和全面，而且会出笑话儿。

首先是看不全面。只见一面，略谈数语，只能得个初步大致的印象而已。再者这实难保正确，尤其是加上相看者的好恶，就更难公正。年长者，如这位未来的新郎的伯母、婶母、舅母等大多老成

持重。他的妹妹（未来的小姑子）由于年青少阅历，就难免偏见了。最怕他有位未婚的姐姐（未来的大姑子）心想我弟弟都在议婚，而我还落（lào）儿哪，伤感之余，妒嫉之心油然而生，相看已毕，其结论必是贬词。姑娘瘦点儿，必说：“瞧那尖嘴儿猴儿腮的，活猴儿崽子！”胖点儿，必说：“缩脖儿坛子，活托儿是个大皮缸！”瞧那两只爪（zhuǎ）子，哪儿像人手，简直是发面包子！”把这位姑娘贬得不成个人样儿了。至于出笑话儿，那就多得很了。举例说，女家得知将在某天出份子时相看其家的大姑娘，偏巧这位大小姐堪与《凤还巢》中的雪艳比美，于是作手脚掉包儿，骗其妹二姑娘去顶缸，来个“吴湘女改换马昭仪”。到了最后，木已成舟，朱千岁也无法原封不动地送回去，只得认命。

经过相看，如果双方皆认为可以考虑，就进行下一步——合婚。如果说这样的相看有点儿可笑，那么，合婚就实在令人可气了。

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来源甚久，自古以来对汉族诸俗影响极大，但满族人本来根本不懂此说。后来北京旗人议婚也有合婚之举，完全是受汉俗影响所致。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满汉二族对此说的信仰程度仍有不同。汉族人大多泥于此说，也就是真信，只要算命的（命相先生）说八字儿不合，当即奉为金科玉律，立即罢论。旗人家虽也合婚，但终是有走过场之意，实际上是假信，最多是引为参考而已，最后仍然决定于门第及其他诸因素。

北京人在合婚前，双方互换“八字帖儿”。这是在一张红纸上写清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以干支记，于是构成八个字。收到对方的八字帖儿，拿到命相先生处，命馆“法合婚”。“合”的内容首先是看男女双方八字儿相合与否，至少是决不可相克，起码要保持互无相损之处；最理想的是女方生来带着“帮夫运”。然后还要确定对父母及近亲长辈有无妨碍。经命相先生批示，将婚姻列为“上等婚”、“中等婚”、“下等婚”。评为上等的，两家必然高兴，毫不犹

豫地进行下去。评为中等的，大多经过研究而后决定。评为下等的，在汉族人家一定作罢，决无进行之理。旗人家做长辈的往往不受此限，仍然考虑诸多因素而决定是否继续进行。旗人虽属假信，但也要合婚。命相先生属于高级的开着“命馆”，不够此级的大多在庙会或街头摆摊儿，担任合婚、批八字儿、批流年、算命算卦等等，兼营相面和测字的是另一分支。这类人靠此混饭吃，所以在合婚时大多讨人欢喜，必对此八字儿赞不绝口，多说吉祥话儿，不难多得酬金。

清代每年由钦天监颁发满文和汉文的《时宪书》，是正式的历书，内容简单而且是科学的。辛亥后，民间出版的“大本儿新皇历”流行于城镇乡村，其内容除月日等正式项目外，增加了大量杂乱东西，如几龙治水、小钱儿挂、八段锦、几日得辛、几人分丙、禄马定生死、小儿扎根儿等荒唐无稽之至，其中有个指导合婚的歌诀，录之如下：

羊鼠一旦休 兔龙泪交流 金鸡怕玉犬 白马怕青牛 蛇虎如刀错，猪猴不到头。

这个合婚歌诀完全建立在属相上，意思是属羊的不可跟属鼠的结婚，属兔的不可跟属龙的结婚等等。当时民间信此不疑。北京人家当有人来提亲时，一听对方属相，马上就代入此歌的公式，只要不合，立即拒绝。北京人不论旗汉大多如此。这样，属相形成议婚的第一道关，此关过不去，一切皆无从谈起。命相合婚据年月日時共八字干支而演释，其范围在八个字中，而依此歌诀，则只决定于一个字：马、牛、羊、猴……比八个字的范围更缩小得多，偶然性更加大多了。那时人们信此，愚蠢至于极点，荒唐可气。不知多少人深受其害而不知其所以然。婚姻本是人与人的关系，只存在于人际，却被一些愚昧无知者弄来一群畜牲——金鸡、玉犬、白马、青牛搅得乌烟瘴气。

前面谈了北京婚礼的第一步，现在讲它的第二步：放小定、放

大定、过礼、通信、过嫁妆。婚姻进行完第一步而开始第二步诸举，可谓渐入佳境，向着高潮迈进。

合婚后认为可以做亲，就要“放定”。北京婚礼的放定以汉族传统习俗为基础，加入一些满式。原来满族人定亲之礼甚简，只要男家馈送女家以马匹、绸缎和肉类。鄂伦春和鄂温克皆为女真之裔，现在仍是在定婚时由男家将马匹、布帛、野猪等送到女家以为聘礼。清代皇子定婚也依此礼而行，由皇家将定礼送到女家即成，并无放小定、大定之说。北京旗人家因久受汉俗影响，定婚之礼甚繁，有放小定、放大定和过礼通信诸仪，这完全是满汉习俗的融合。放定就是汉族古老的婚俗“纳采”之仪。十分明显，“纳采”是汉俗，而北京婚礼放小定的礼品中旗人家必有“荷包”和“如意”此二者就是投入汉俗中的满俗影响，从而形成满汉二俗的融合体。

北京人放小定时，男家事先必请本家和戚友，从族人或姻亲中请出一位丈夫和子女俱全的长辈妇女到女家“下定”（也说“放定”），北京话称这位有夫有子者为“全 ke 人”（这个 ke 来自满语的 ngge 意思是“的”。无适合的汉字可写，只好写汉语拼音字），放小定的定礼汉人家与旗人家大同小异。汉人家男方向女家赠送首饰，如戒指、耳环、镯子等物。将这些礼品装在带红色喜字的玻璃匣中，用粉红色包袱皮包着，送交女方。大多由媒人陪同前往女家。此日男女两家皆举行宴会，本家和亲友欢宴竟日，道贺道喜礼成后始辞去。旗人家放小定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定礼中必有荷包一对，内置小金锭、小银锭、小金如意、小银如意。此外必有大如意一柄，有三镶、金玉、翡翠等，至于簪环首饰等则与汉人家相同。其送定礼的方式和礼仪也是旗汉相同的。

汉族传统婚礼中有“问名”之仪，北京的旗人也曾模仿而行，但近七十多年来，北京的旗汉人家渐废此礼，后来就取消了。问名之仪是在放小定以后，男女家长带着未来的新郎到女家叩拜，如果是汉人，则由男方长辈致词；如果是旗人，则由男方长辈或其牛录章

京致词。女家设宴欢迎。清代皇家依此礼而行，皇子定亲后必须到女家叩拜，女家设宴欢迎。

放大定后继之以放大定。放大定也就是“过礼”，这是由汉俗演化发展而来的。北京是数百年的古都，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商贾汇集，财源辐凑；仕宦广聚，冠盖如云。数百年经济和政治的兴盛必然形成高度文化，况且四方人士集于京师，自然将各地风习引入北京。因此北京婚礼放大定之仪比原来的“纳采”只有繁而无简。旗人初效汉俗时放大定过礼原较简单，只是男家将猪、羊、鹅、酒送往女家以为聘礼。送猪、羊、酒三物本是满洲旧俗，送鹅则完全是仿效汉俗。汉族古老婚礼订聘时就必须有鹅，原因是鹅与雁同（大概汉族自古即知鹅是雁驯化而来的），雁是守信用的鸟，订婚时用鹅（以代雁）完全是为了昭信。满族先世并不懂这个道理，进关后，北京的旗人才这样学会了汉俗。此外还要送钗环饰物，还送大馒头，称为子孙馒头。

后来，放大定过礼日趋繁复，花样更多了，北京人不论旗汉皆依此而行兹简述如下：放大定过礼是婚礼中的大典之一，是全剧的第一个次高潮，所以礼仪隆重，热闹异常。

男家在准备放大定过礼前数日，首先要购买白鹅成对（那时市上鸡鸭店出售颈部和背部染着粉红色的白鹅，专为过礼而用）养在家中。到喜轿铺去讲“鹅酒台儿”，台儿数可多可少，总得是双数（偶数）。台儿为木制，上着金黄色大漆，彩画花卉和凤凰。所谓台儿，是个立式盒子，上有梁，用红色杆子穿着二人抬行。大多自六台儿始，一般为八台儿，还有更多的。以鹅和酒为主。鹅置于红色木笼中，放在台儿上。酒置于坛子里，放在台儿上。其他则为衣服、饰物、食物，分别放在台儿上。衣服种类多而数量大，单、夹、皮、棉、纱俱全，色彩尽皆鲜艳，以红、粉、绿为多。饰物自耳环、戒指、镯子等以至于梳两把儿头用的各种发针和偏方儿等俱全。饰物置于喜字盒内放在台儿上。食物有大饽饽和各式满汉糕点，有

猪腿和羊腿，有茶叶。汉人家大多用红纸包两支藕，放入食盒中，还必须有苹果、柿子（柿饼）、桂圆。旗人家不大注意这些果品。食盒分层摆盘。过礼的礼品大致是这些，旗汉人家都是如此准备。

定礼备齐并请来喜轿铺装台儿安放已毕，即行过礼之仪，以完成放大定这一大典。男家请两位长辈妇女“全 ke 人”为使，赴女家送定礼。是日不但男家请本家亲戚，举行小宴，女家也是如此；双方都浸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二位“全 ke 人”各乘轿车，车铺红毡，随“台儿”赴女家。女家欢迎招待。汉人家例奉白糖水和桂圆，后来旗人家也仿效而行。这时已将“台儿”抬至女家，将衣服、饰物和食品放入屋里，鹅笼和酒海放在院中。例由一儿童挑开食盒的红纸封条，取得红纸包着的跟头搭裢，其中装着些零钱。男家使者与女家主人互致贺词，礼成而返回男家。

汉人家过礼在食物中有不少果品。柿、柿饼谓“事事如意”，枣谓“早生贵子”，栗谓“立利子”，苹果谓“平平安安”。南方籍的汉人以桔为“吉利”，桂圆为“圆满”。旗人则少有这些，而以饽饽和肉类为重，这仍是满洲旧俗。稍一观察，不难发现北京习俗这一满汉混合体中，各自保持特点之处甚多。

女家收礼后，衣服和饰物留给新人用，肉类和点心大部分用于谢媒，小部分赠亲友。鹅则售于鸡鸭店，再供过礼者购用。送酒的数量很大，一般都好几十斤；女家除自用外，也送给媒人。

原来放大定与过礼分开进行，后来合二为一以图简便。再后来，将“通信”之礼也并入放大定之内了。通信是双方决定结婚日期。汉人多请命相先生决定日期，旗人有如此的，但大多不如此而自行决定。后来北京旗汉人家多免去通信，而并入过礼中。

继之而至的是本剧第二个高潮——过嫁妆。过嫁妆与过礼并无大差别，只是因为嫁妆比定礼多，声势自然加大，显得比过礼热闹。遣嫁女儿之家以准备嫁妆为大事，颇费资财，虽说量力而行，但多图体面而尽力求丰。嫁妆以“台”论，放大定过礼也论“台”，但

北京话把过礼的“台”字说成“台儿”，而对嫁妆的“台”字决不加儿化。说颠倒了，显然不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台数不定，以十二台为最简，是起码数，十六、二十四、三十二为中等和较丰，够六十四台已甚丰，到一百二十台的即属罕见了。嫁妆中凡可抬行者抬行，有些如高大的玻璃罩内各色盆景则不宜抬行，必须用“窝脖儿的”放在颈后扛行。关于北京的“窝脖儿的”将在另文中谈。送嫁妆者是专行，平日拉排（音 pǎi）子车和以窝脖儿办法为人搬家。此项人专会摆嫁妆台，令人一看必感精彩之至。这样，有抬有窝脖儿，五颜六色，浩浩荡荡，结大队而行，怎不引人伫立而观，所以声势远较过礼为大，热闹异常。

原来满族人家的嫁妆甚简，且具特色。据近年来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报告，鄂伦春和鄂温克妇女平日家务劳动中包括鞣皮和捶打鹿筋成线以用于缝纫。鞣皮用刮刀等工具，捶鹿筋用木榔头。有趣的是满族传统婚俗的嫁妆中就包括鞣皮和捶筋工具，充分说明这是女真人的古老习俗。听长辈讲，满族嫁妆自古即有此二物，入关后长期间保持此俗。后来不鞣皮也不捶鹿筋了，嫁妆也跟汉人大体相同了，但“辽东旧族”特别是重视旧俗之家仍这样做。当然，清代后期多已不这样了，但仍有前辈知此。这是民俗学研究中的极珍贵的材料。

清代后期，旗汉人家的嫁妆大同小异，这是以汉俗为基础而形成的。衣着类极丰，自鞋袜至内衣衬裤，旗袍、坎肩、马褂等单、夹、皮、棉、纱齐备。这里顺便谈一事，满族自其久远先世即以狩猎为世守之业，满人原来不穿羊皮衣，而穿“直毛儿”，如貂、狐、猞猁、灰鼠等皮，这些皆为狩猎产品。羊皮是畜牧业的产品，所以以畜牧为世守之业的蒙古人穿它。这说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满人进关后，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但穿羊皮衣乃是到清代后期才逐渐开始的，而且还是不习惯的。直到清末，满族人自皇家至民间，以翻穿白色羊皮衣，羊毛朝外，为丧服。因此，旗人家

很少以羊皮衣为嫁妆，而仍以“直毛儿”为尚。衣服外则是被褥枕头等床上用品。首饰也是主要的一项。此外则为室内陈设，如帽筒、帽镜、座钟等等。在陈设类中，旗人家极重视大瓶和大盘。大瓶称为大掸瓶，大盘称为大果盘；所谓“九桃瓶盘”是极讲究之物。在大条案和大架几案的两端，例是摆放九桃瓶盘之处。此二物极大，其每一件都比现在的大型彩色电视机占地地方。嫁妆中也可包括木器。这是源自汉俗，是南方汉族的习俗，传入北京，旗人效此而行。木器以箱为主，有箱必有匣（其实就是小箱子），箱贵樟木，可见源自汉俗。至于条案、大柜、八仙桌和椅子等物，在木器中虽是主要的，但在嫁妆中则非必有之物。

仍由喜轿铺出台，派专人将嫁妆装台。女家请四位“全 ke 人”看视指点，装好后抬行。这是一个可观的队伍，一名当头儿的手执手掸指挥，掸上挂一张吉庆有余图，队伍最后是送嫁妆的使者（即四位“全 ke 人”乘坐轿车（车铺红毡）随行。送至男家，将嫁妆抬入新房。男家备酒席招待，双方道贺，使者并不吃喝，告辞而去。这一天，男女两家皆请来本家和戚友，举行宴会。一般在过嫁妆之次日即为迎娶之期，所以这是进入喜事的最高潮期，双方全家喜气洋洋，送贺礼者纷至，账房早已派专人司理“口子上”的厨师已将行灶建好，开始“滚（lào）作（zūo）儿”。一切准备停当，只等次日发轿，进入喜事的第三步。

现在讲北京婚礼的第三步 迎娶、响房发轿、娶亲送亲、扶轿杆儿、见面分大小、吃酒开箱、拜客、回门。这第三步是最高潮和其后的尾声。以前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是这第三步的准备。

北京汉人家有响房之举，即在过嫁妆的那天下午，也就是迎娶日的前一天，将近黄昏，这时男家的本家亲友群来道贺，吹鼓手金鼓齐鸣，吹打大作，称为响房。届时吹鼓手在喜房门前排成两列，鸣鼓响锣，震耳欲聋。早年旗人这样响房者极少，后来汉俗日益遍及，旗人家办喜事间或也有这样的，但旗人家仍以“打锣”为响房。

不是在迎娶日的前一天，而是在迎娶日即将发轿时，由男家的本家或亲戚的一位男孩子在喜房内打几声锣，锣声响完即行发轿；这是旗人家办喜事的响房。因此在北京婚礼中，旗汉人家的响房在日期和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当然，后来满汉习俗日益融合，于是旗人家也有既在迎娶前一日响房，又在即将发轿时打锣的，这是满汉合璧。

前已言及，北京汉人家迎娶用一顶花轿和一红轿一绿轿共三顶轿，旗人只用一顶大红咯咧呢官轿。在卤簿（执事）上，汉人与旗人明显有别。汉人家迎娶，在轿前排行的卤簿是旗、锣、伞、扇，还有金瓜、钺斧、朝天镫，这是汉式最普遍常用的。旗人的卤簿则显示出满族作为狩猎民族的古老习俗传统，并表现出古代部落抢亲的遗迹。最明显突出的是“牛角泡子灯”和“箭手”，纯系满洲旧俗，与汉式完全不同。此外，满族婚礼中，新娘坐轿而行时，其兄弟必须“扶轿杆儿”随行，实寓护送之意，这也是纯满俗的特点之一。

先说说牛角泡子灯。北京汉人婚礼发轿迎娶时所打的执事，到清代后期也为旗人所用，但不以此为主要卤簿，而以牛角泡子灯为满族特色。灯是列队而行的，自十余对至四十余对，皆为偶数成对。灯以牛角制成，圆形，透明，外有红色喜字和蝙蝠图样，以红色木杆托举。再说箭手，满族迎娶时，喜轿前有四人至十余人乘马列队而行，这队乘马者左佩弓右插箭，全依满洲旧俗。到清末也有将弓矢背在身上乘马而行的，已失旧观。高举牛角灯和佩弓矢骑乘而行，充分表现满族先世的狩猎和部落间征战遗风，同时表现出抢婚的残存情景。使人由此明显看出，古老的满族先世部落生活中，人们日常出去围猎，部落间和氏族间不时征战。部落或氏族间时常武装掠夺，掠夺财物和人畜，同时抢婚，抢来外部落外氏族的女子强行婚配。掠夺多行于夜间。这时一个族党屯寨的人集结出动，夜晚高举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而行，人们身佩弓矢，骑乘马匹，结队前进。行至另一部落或氏族居地，施行武力掠夺。这必然

引起双方激战，战胜者夺得财物和牲畜，也夺得人口。这是猎人部落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事，毫不足奇。这也完全说明了满族婚礼在迎娶时举着牛角泡子灯并有箭手列队而行的原因和由来。

至于扶轿杆这一满族习俗，源自护送。姐妹出嫁，兄弟在轿旁护送，是由抢婚发展而为二氏族结亲后演变而形成的。护送说明古代氏族间建立婚姻关系是存在不和谐因素的，常因此而发生争斗，所以有必要护送。

社会学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演变，当然是以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高度为前提，但“强制”仍是起决定性意义的一个因素。男子将女子强行纳入自己的氏族内，是强制而行的，受到母系氏族的强烈反抗。母系氏族是自然形成的，父系氏族则是在强制下形成的。此话虽离本文主题已远，但从满族婚俗中的突出表现看，充分说明此事；兹不多述。再者，北京满族家女儿出嫁在将上轿时必须放声大哭，新娘都是在痛哭中被人搀上轿子，抬出家门很远后仍然哭声不绝。这完全证明女子是在极度被迫下被纳入男方氏族的。后来人们解释临嫁而哭是表示舍不得父母之意，那是十足的曲解，是为了提倡孝道而歪曲事实。

此时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随轿而行，满汉不同之处只是满俗乘轿车，依汉俗则乘一红一绿两顶轿子（新娘的轿子是放着轿帘的，娶亲和送亲的轿子则打开轿帘而不放下）。开道锣领先，牛角灯居次，然后则为旗锣伞扇各类执事。上轿前还有一些汉俗，后来旗人亦有效此而行的。例如娶亲太太等新娘坐入轿内后，用簪子挑新娘额前上方头发梳成一个小髻，插上红绒花，并戴上“盖头”。女家给新娘一个苹果拿在手中，将另一苹果放在轿底，谓之“平平安安”。这时男家将“离娘饭”送给女家收下。女家准备一对小磁饭碗和两副红色筷子，系以红绳，称为“子孙碗筷”，交到男家供吃“子孙饽饽”和“长寿面”之用。

喜轿到门后，有一系列满俗，后来融和汉俗而成为北京婚俗，

满汉共用。简述如下。

喜轿抬入院内，要从燃着的炭盆上抬过，这是纯满俗。进入北京婚俗后，人们以取兴旺之意解释这个过火盆之仪，实系曲解。满族自其先世部落时代，迎娶时在屯寨外筑一幄幕，满语称此为 *tatan*，也是人们猎于山林中临时搭的简单住处。清初史籍中有几处谈到爱新觉罗氏族成员娶亲时构筑这种帷幕以行婚礼的记载，这是有文字可考而为人所皆知的。后来北京婚礼中的这盆炭火，实即当初在野外构筑 *tatan* 时所燃的篝火。喜轿过了火盆而抬至喜房门前，新郎搭箭张弓向轿帘处射三支箭，这也是满族先世部落时代抢婚的遗习。自古肃慎氏以楛矢石弩诸称于世以来，满族先人数千年来以弓矢为生产和战斗的工具。用武力掠夺别的部落，夺其人口，强行婚配，用弓矢去抢，抢来后用弓矢威胁以迫其就范；这就是新郎射三支箭的由来，并不是为了把新娘带来的妖精赶跑。这时新郎用箭将新娘的盖头挑起（满洲旧俗一切不离弓矢，杀人也用弓弦勒死）。依汉俗则是新郎用手抓去盖头。随即“拜天地”和“坐帐”。

坐帐时有一纯满俗，汉族人家决无此仪，那就是“阿查布密”，亦称“阿什乌密”。其意就是汉语所说的“合卺”。满语规范语依建州女真语音而将此词写为 *acabumbi*。女真语音动词词尾——*mbi* 的 *b* 不发音而说成——*mi*，于是将 *acabumbi* 并不读成“阿查布穆必”而读成“阿查布密”。满语主要口语之一称为京语。根据京语音变，词中的 *ca* 有时将元音 *a* 脱落，*c* 又变成为 *s*。词中的 *b* 有时发音为 *w*。这样一来，*acabumbi* 经过音变就读成“阿什乌密”了。总之，北京旗人现年近七旬者不少人知道“阿查布密”或“阿什乌密”，但决不可机械拼读为“阿查布穆必”，那样就闹笑话了。此仪是新娘和新郎坐帐，炕上放一张炕桌，将一只烤熟的整羊用大红漆方盘盛着放在炕桌上，由一位“全合人”喂新夫妇各吃一口烤羊肉。这时，在新房窗外有人读满语祝贺之词，萨玛在院中跳舞。早

年间满人精通满语，萨玛即兴编成祝词，随口而颂，同时舞蹈。后来（清嘉庆时代以后）北京的满族人的满语水平日降，于是将此祝词编成固定的词句，合 晷时背诵一遍。《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一书是乾隆时代所修，其中列有“朝祭、夕祭、背灯换索、柳树求福”等以及诸多祭祝词，还有“乌林祭神、堂子祭神”等许多祭祝词，但没有记载着“阿查布密”祝词，这是因为它并不是祭祀，而本来是即兴随口编成的祝词，后来虽成定式，但不记载于此书中。因此，近六七十年来，人们大多不知此词是何内容了。前两年听人说，近年“皇帝热”、“宫廷热”正炽时，有一电视剧演清代某帝婚礼，是由现在的人编了一套祝词而拼读的。至于这时所跳的萨玛舞是个什么样子，也为人所不知了。笔者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王府中婚礼上听过这段满语祝词，见过这个萨玛舞。清代“阿什乌密”满语词如下：

“sain inenggi de sarin deribufi, urgungge inenggi de urun dosimbufi; boodê ujire ulgiyan be wafi, abka na de bisire enduri weceku de gingguleme jukteme cacu bufi, holbobure jalin.

“eigen sargan de hūhuri nonggibure be bahabuki. ujui funiye-he salambu, anggai weihe solombu, nimeku akū, uyun se de nekulafi, tanggu aniya jalubufi, aniya galmin, se labdu bahabuki. booi gubci bayan wesihun de isinafi, urgun sain de acabuki.”

译成汉文是：“良辰开喜宴，佳日娶新人。持家饲之豕兮，以祀神。神其赐福兮，佳偶是成。神佑此夫妇兮，福祉日增。白其发布，黄其齿兮，百恙不生。九旬而健兮，百岁修龄。年长岁永兮，享寿无穷。宜其室家兮，富贵恩荣。阖第得吉兮，感戴神灵”。这是将满文译成汉文。其内容与满族祭天祭神的祝词并无大异，不外乎祈求神佑之语。

新郎新娘皆著礼服。依清代服制，满汉男子服饰相同，为官者与未仕者各依定制而穿戴；女子服装则有满汉之别，即所谓旗装和

汉装的不同。在礼服方面，汉族女子的礼服是上衣下裙，缠足，梳汉式头。旗人女子的礼服是穿旗袍（长衫），梳两把头，穿花盆底鞋。旗妇礼服有一最大特点就是梳两把头，戴“钿子”（关于钿子，将在谈满族服饰的文章中介绍）。新郎和新娘的礼服就是这样依满汉之分和官民之别而穿戴的。旗人的新娘必须戴钿子。

新妇与新郎同拜天地（汉人家设天地神祇，旗人家原不设神祇，后来也有随汉俗的），共饮交杯，然后按亲疏远近而行见面礼。先拜见本家长辈，次拜姻亲长辈，依次而行礼；平辈也互相见礼。这就是常说的见面分大小。接着就有女家来人到男家“吃酒”。旗汉人家例由新娘的姨母婶母和姐妹等人共赴男家吃酒，男家招待，但仅坐席而不饮不食，一上汤立即“放封”告辞而去，实即尽礼而已。喜事中有多次宴会，如迎接娶亲太太和其他诸仪皆设酒席，皆仅入席而坐，但不饮不食，茶房一上汤，坐席者立即“放封”告辞。“封”是一个红纸封套，内装赏银，只要一上汤，立即掏出这个红封套放在桌面上，同时告辞，主方此时决不挽留，因为这是礼仪的规定，不同于一般的请客吃饭或访亲拜友（结婚次日还有一次“吃酒”之仪，下面讲）。这时男家设席招待娶亲太太，坐席上首只摆一椅，请娶亲太太“独坐”以为酬劳。

这时已近黄昏，到了吃“子孙饽饽”和“长寿面”的时候。子孙饽饽是极小的饺子，一般是比大个蚕豆粒稍大而已，由女家制作而送至男家。汉族人家特重视子孙饽饽，常在饺子外加制“盒子”外捏花边，甚至以红绒线穿系，十分精致。长寿面由男家制备。“口子上的”厨师有此手艺，会抻“一窝丝”，细如现在的“龙须面”一般，切面铺也定制这种面。子孙饽饽和长寿面皆不煮熟。吃时用女家送来的喜碗喜筷。新夫妇左右列坐，全舍人“喂二人吃一口”，边说“福寿双全”、“白头到老”、“儿孙满堂”等吉祥话。这时必有亲友家小儿在窗外大声问“生不生？”屋里答曰“生！”表示养育子女。喂长寿面时，全舍人“用箸高挑面条，说‘长寿永年’等语。这显然

源自汉俗 后来北京旗人仿效而行。问“生不生？”意思是由饺子没煮熟的“生”转而引用于生育的“生”。从语言上明显证明它决非满俗 因为满语词“生熟的生”与“生育的生”在音上毫无相关。各地汉族久存花烛夜闹新房之俗，北京汉族人家则此风不盛，一般少有闹新房的，至于旗人，则决于闹房之举。旗人家在结婚当天和以后三日至五日内，新房是禁入的。

结婚次日早晨，旗人家新妇有“抱柴”之举。多由长嫂备好一束桃木杆，用红绒线捆齐，交给新妇，以示日后勤劳操作之意。新夫妇同至厨房拜灶王爷，旗人家则二人同拜祖宗杆子和祖宗板子。接着二人对父母和诸长辈叩首行礼，旗人家平辈互相请安。这时女家至男家会亲 男家设宴招待 这是正式的“吃酒”。男家设宴四桌，新郎父母在席前举杯致贺，并谢女家。新郎向每桌磕三个头（一跪三叩首）。北京汉人家此时新妇也出来与新郎一同叩首，旗人家则只有新郎叩首，新妇不参与。女家人员大多只坐席而不饮食，男家将此四桌酒席送到女家去。也有新妇之母略进饮食的，新郎之母为新妇之母斟酒致贺，也是上汤就放封。北京汉人家称新妇之母于结婚次日赴男家“吃酒”为吃“梳头酒”。亲家母吃酒后，多入新房对女儿说些教导之词，然后辞去。

女家来“吃酒”时，将衣料及其他诸物装箱送至男家。吃酒完毕，即行“开箱”之仪。女家送来的箱子里装的大多是衣料、鞋袜、化妆器、文具等物，开箱后将物品分赠男家诸人 这是新妇初入夫家时带来的赠品。北京旗人家重视“开箱”，不论女家贫富状况如何 开箱赠物力求其丰，以表示“作脸”。北京旗人事事不忘“耗财买脸”这方面也有明显表现。

婚后四日或六日“回门”新妇回娘家（归宁），旗人家大多由女家备轿车（骡拉的车）赴男家接二位新人回新妇母家。二人来到后，先拜女家祖先，次拜长辈，平辈互相请安。中午例由女家盛宴招待，尽欢而散。这是新妇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新郎饭后先回自己